



隆都方言

中山文史

第六十九辑

「丹麦」易家乐 著
康志洪 译
陈绍锦 校

SPH
广东人民出版社

隆都方言



中山文史 第六十九辑



〔丹麦〕易家乐（Søren Egerod） 著

康志洪 译 陈绍锦 校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隆都方言 / (丹) 易家乐著; 康志洪译; 陈绍锦校.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12

(中山文史: 69)

ISBN 978-7-218-11461-3

I. ①隆… II. ①易… ②康… ③陈… III. ①粤语—方言研究—中山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9248号

LONG DU FANG YAN

隆都方言

(丹) 易家乐 著 康志洪 译 陈绍锦 校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李锐锋

特邀编辑: 戴程志 郑梅清

装帧设计: 陈宝玉 吴可量

封面题字: 赵元任

统 筹: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

执 行: 何腾江 吕斯敏

地 址: 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社8楼(邮编: 528403)

电 话: (0760) 89882926 (0760) 89882925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编: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8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760-89882925)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760) 88367862 邮购: (0760) 89882925

序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不同方言不仅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而且每一种方言的形成都有悠久的历史，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既体现一个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出这个地区的历史变迁、人口迁徙、风俗民情、空间阻隔、交通状况、语言接触等情况，是地域文化特质的显著标志和重要载体，并成为地域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文化通常体现在公众符号中，语言是最典型的公众符号系统。社会成员通过这些公众符号交流思想，联系感情，维系世代。保护方言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地方历史，构建个体身份认同。中国地域辽阔，地上地下古物甚多，一些方言中保存的古汉语较为完整，承载着古代的大量语音、词汇、语法、历史，某些文物出土后，只有用当地的方言才能进行鉴别和解释。这些方言一旦消失，就无法还原古书记载的古代语音面貌，对考古和历史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与这种方言息息相关的族群历史、风俗习惯、文化信仰也将难以复原。

语言表面上是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实质上构造了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的思维方式。任何一种方言都体现一个族群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人最初通过模仿母亲的语言学习的语言，这种“母语”，是形成自我与发展个性的动力来源，也成为塑造思维方式的准则。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地域隔绝，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讲着不同的方言。中国方言的多样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保护方言的多样性也是保护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个体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所属群体的身份，讲同一种方言的人与这种方言构成的群体休戚与共。方言是不同文化、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人文历史、不同族群血统的典型表现，寄托着一个族群的亲情历史，是个体从属于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也是表达族群感情、体现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文

化认同首先来自于语言认同，方言维系着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乡音不仅承载着乡愁与回忆，也是对族群和民族的认同。一种方言的消失意味着这个群体的解体。

中山市是个方言岛，广东省的三大方言——粤语、闽语、客语兼而有之。由于各种方言来源不同，经过多年互相渗透、相互交杂、互相影响，使中山的方言具有复杂性。中山的闽系方言分布在五桂山区的外围和石岐以西地区，其中又细分为三乡话、隆都话和张家边话。这三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其语音“隔村而殊”。比如，同属于闽系方言区的张家边、南朗、三乡与沙溪、大涌等镇方言的发音就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沙溪、大涌两镇都讲隆都话，音调高低也不同，大涌话的音调略高一些。

关于隆都方言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屈大均^①的《广东新语·土言》。岭南词人杨铁夫^②，是较早系统研究隆都方言的学者，其所著《隆都话语原考》，对隆都方言的渊源进行了考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山大学学者黄家教在《粤方言地区闽方言岛——中山隆都话》^③中，论述了隆都方言属于闽系方言及其特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隆都方言的研究蔚然兴起，成为广东各大学中文系学生毕业论文的题材之一。1987年，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柏松的学位论文——《石岐方音》对隆都方言的语音、变调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载入《中山市志》（1979—2005）和《沙溪镇志》^④。

中山的方言基本上都由外地传入。在南宋时期的历次战乱中，

① 屈大均(1630—1696年):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著有《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

② 杨铁夫(1869—1943年):名玉銜,字懿生,号铁夫。世居香山县隆都申明亭村。清光绪辛丑(1901)举人。著名词人。对汉字和广东方言颇有研究,著有《〈说文解字〉述证》、《铁城土语原考》(三卷)、《隆都话语原考》等。

③ 此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85年第7期。

④ 中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市志》(1979—2005),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山市沙溪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沙溪镇志》,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大量中原及江南等地人口迁居中山，各地方言亦随之流入。由于隆都人的祖先大多由福建迁居中山，如大涌镇的萧姓、林姓家族祖先都是从福建迁徙而来，受其祖居地语言的影响，其方言包含福州话、厦门话的成分较多。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外来方言与当地方言相互交融，使中山的方言逐渐发生变异，有别于迁出地的方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人口流动加快以及各类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方言快速衰微。一些村落涌入大量外来人口，为方便日常生活沟通交流，他们往往选择使用普通话，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时至今日，本地方言只同镇同村范围内“同声同气”的少数人之间使用，有些甚至一个村只有几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才会讲。可以预见，当这些老人驾鹤西去之后，许多方言将不可避免地消失。

为保留隆都方言这一历史文化载体，让隆都地域文化至少成为历史子遗，中山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动翻译出版了《隆都方言》中译本。这是丹麦汉学家易家乐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他的导师、旅美汉学大师赵元任的指导下用英语写就的博士论文。因《隆都方言》的出版，易家乐先生获得哥本哈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奠定了其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刘秀莲

2016年12月22日于中山市

译 序

在翻译易家乐 (Søren Egerod, 1923-1995) 的《隆都方言》(the *Lungtu Dialect*) 之前, 我只模糊地知道, 中山市除了属于粤方言系统的石岐方言外, 还有一些其他系属的方言, 其中包括闽系方言。由于孤陋寡闻, 自己从未听过“隆都话”或“隆都方言”。幸运的是, 通过翻译《隆都方言》, 对隆都方言以及中山的语言演变历史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认知。希望《隆都方言》中译本能为国内专门从事语言学和方言研究的人士提供参考, 对那些对中国方言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有所裨益。

因翻译的需要, 我对易家乐进行了一定了解。易家乐在汉学和东亚语言研究方面功成名就, 除了自身的勤勉努力之外, 与他师出名门也息息相关。他有幸先后在三位泰斗级汉学家的指导下学习普通语言学 and 汉学, 这三位大师分别是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叶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世界汉学里程碑式的人物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美籍华裔语言学家赵元任。易家乐是继叶姆斯列夫之后丹麦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 他在汉语方言及东亚语言研究取得显著成就, 是该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 在国际汉学界甚至被一些人看作高本汉的后继人。他的三位导师对他的影响在《隆都方言》中也有反映。例如, 他的调查卷就采用了高本汉收录到《词典》中的汉字, 韵母讨论采用了高本汉在《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中的重构式; 讨论词序与词类时引用了叶姆斯列夫的观点; 声调描写借用了赵元任的调值五度标记法, 易家乐在《前言》中告知读者, 赵元任与《隆都方言》的成书直接相关。

易家乐著述颇丰, 继《隆都方言》出版之后, 又陆续发表多篇汉语方言研究和有关台湾原住民语言研究论文, 并著有《泰雅语—英语词典》(*Atayal—English Dictionary*)。此外, 1955年, 他将《庄子》若干篇译成丹麦语, 并为我国翻译家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全集》

撰写过书评。

易家乐一生担任过许多与汉学及东亚研究相关的教职和研究机构的职务。1956—1965年间，他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助理教授职务；1958年起，成为哥本哈根大学文学院东亚语言教授；1968—1969年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1967年起，多次担任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中心（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席；1975年，欧洲的汉学家联合成立了“欧洲中国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hina），易家乐担任该学会第一任会长；担任丹麦科学院院士，是瑞典隆德大学的荣誉博士。

早在1949—1950年期间，易家乐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经由哥本哈根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授予的一项资助，得以在中山学习粤方言、中山客家方言、石岐方言和隆都方言。《隆都方言》是他的最早成果，该书成为易家乐1954年向哥本哈根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于1955年8月被哥本哈根大学哲学系接受，并授予其哲学博士学位，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

《隆都方言》分为概述、共时描写和历史渊源三个主要部分。在概述中，作者简述了隆都方言所处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音位符号的确定和非隆都方言的音位标注进行了说明。共时描写是全书的精华，在这部分中，作者对隆都方言的音韵、词序与词类以及隆都方言与中山的主流方言石岐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十分详尽的隆都方言字音表，并通过音位标音、汉字书写和英译的方式整理出一些隆都方言的白读和文读文本。在历史渊源部分，作者将隆都方言的语音追溯到中古汉语时期。他以前人推拟的中古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为基准，对隆都方言与闽系方言、隆都方言与石岐方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找出隆都方言发展演变的大致脉络，确认了隆都方言属于闽系方言的南部分支；确认隆都方言白读兼有闽系方言中白读与文读的成分，两者共同构成隆都方言白读的基础，而隆都方言的文读主要基于粤系的石岐方言，因此使其迥异于其他闽系方言。

《隆都方言》取材丰富，描写细致入微，富有创意。作者制定的隆都方言字音表和引用的白读文本中，多次使用了空白符号“□”

来代替有音无字或本字不明的音节,没有贸然使用语源不明的同音字。这是无奈之举,但往往被当今国内方言研究者采用,体现了作者治学严谨,绝非是作者方言知识不足,相信隆都方言区的读者能够谅解。《隆都方言》中,作者大胆使用了一些自创的术语,他称之为“半新的术语”,其中有些术语迄今未被英语词典收录,如 *approximatable*, 译为“可概约词”; *conjugatable*, 译为“体貌可变词”等。

当然,《隆都方言》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体例过于繁杂,尤其在论述隆都方言词序与词类的部分,篇章结构的层级有八级之多,令读者眼花缭乱。其次是在白读文本的处理方面,采用了音位标音、汉字书写和英译^①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汉字文本主要基于粤方言,而不是基于隆都方言,令人费解。为此,书中引用的民谣和民间传说汉字版本在描写准确性方面打了不少折扣。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作者对这些白读文本的英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②。受作者当时所处的学术环境所限,《隆都方言》在体例和一些技术细节处理上与国内学界遵行的惯例和当前的规范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某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舛误。为忠实原文,也为了方便国内读者,翻译时对相关的内容作了译注、说明或其他形式的技术性处理,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考虑汉语阅读习惯,对译文的目录形式进行了一定的精简,对原著的目录仍依照原有格式翻译,并作为译作的附录放在正文之后,供读者参考,并省略了原著的丹麦语摘要。

二是《隆都方言》采用的注音和声调符号与当前国内汉语语言学界的惯用形式颇有不同。为此,在方言学者郑梅清帮助下,将作者所使用的注音和声调符号与当前国内学界常用的符号进行了对照^③。

三是原作中某些用符号“□”标示的空白处,译文仍尽量予以保留,同时用译注予以说明。如原文多处用了“□□”表示“芦兜”,

① 原著英译在本译文中译成汉语普通话。

② 作者偶尔用问号表示某处译文的不确定性。

③ 注音符号对照见正文前《本书所用注音符号与现行国际音标对照表》,声调对照见相应各处的译注。

译文中仍保留“□□”，并在相应的译注中释义为“芦兜”。

四是将隆都方言白读文本译成现代汉语普通话时，既参考了易家乐提供的英语译文和语音转写，也分利用了发音人用汉字^①誊写记录下来的白读文本，力求成为最合理的译文。

在语言地理方面，中山市就像是一个迷你版的广东省，汇集了广东最主要的粤、闽、客三大方言的多种次方言。它们之间的互动与接触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鲜明个性，使中山成为方言研究的理想之地。这也是易家乐和他的恩师赵元任分别选择中山的隆都方言和石岐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隆都方言》的问世，不仅成就了汉学家易家乐，也为我国的方言研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语言材料，这在国内方言日渐式微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康志洪

2016年12月1日于广州

① 这些汉字主要是粤方言字。

本文已获哥本哈根大学哲学系同意出版，以资
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用。

年度轮值系主任

凯伊·巴尔 (K. BARR)

1955年7月8日于哥本哈根

献给我的老师

凯伊·巴尔 (KAJ BARR)

赵元任 (Y. R. CHAO)

K·格伦贝赫 (KÅRE GRØNBECH)

叶尔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本书所用注音符号与现国际音标对应表^①

本书所用注音符号	对应的国际音标 (符号)	备注
‘和’	‘或 ^h	表送气, 例如 p’ (p ^h)
q	ŋ	
mb	m ^b	
nd	n ^d	
ŋg	ŋ ^g	
/v/	~	例如 ě 表示 e 的鼻化
r (声母)	ʐ	
φ	φ	
[m̥]	m̥	
[ŋ̥]	ŋ̥	
c	ts	
ch	ts ^h	
c ^s	ts	在隆都方言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tɕ	在粤方言声母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c ^{s,}	ts ^h	在隆都方言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tɕ ^h	在粤方言声母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š	s	在隆都方言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ɕ	在粤方言声母描述部分偶有出现
t ^s	tɕ	
t ^{s,}	tɕ ^h	
/x/	ɕ 或 ɕ	北京方言部分
/r/	-r	表示儿化
/qr/	-r̃	
/wr/	-ɔ ^r	
?p=	-p	表塞音韵尾 p; ?t=、?k= 等与此类同

① 此表为译者所加。

(续上表)

本书所用注音符号	对应的国际音标(符号)	备注
aa	a:	表长元音 a, 今亦直接写作 a; 文中出现的其它双写元音均与此类同
a	ɐ	表短元音 a, 今多写作 ɐ; 文中出现的其它与双写元音相对应的单元音均与此类同
声母的零形式	∅	即零声母

译者说明:

1. 文中用作韵尾的 j、w, 在今汉语方言中基本用相应的元音 i、u 表述。例如 iw 表述为 iu, aaj 表述为 ai。

2. 文中所出现的术语“元音与元音连缀”在疑为“元音及其音位变体”。

3. 文中声调的描述中所用到的“下”、“上”分别对应今汉语方言中的“阴”、“阳”。例如文中的“上上”、“下上”分别对应今汉语方言中所说的“阴上”、“阳上”。

4. 文中隆都方言部分, 所有出现的未标示声调的音节, 其声调都为 33 调。

5. 今汉语方言中连读变调的表示方法多采用五度标记法(与书中所用注音符号不同); 例如, ua⁵⁵⁻¹¹表示原调为 55 调, 变调为 11 调。

前 言

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经由哥本哈根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授予的一项资助，我于1948—1950年旅居中国，期间所收集的资料便是本文成书的素材。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耗时半年有余，我在中山地区学习了（澳门地区的）标准粤方言，此外，还学习了中山客家方言、石岐方言，以及本文所讨论的隆都方言。1950年2月抵达美国的时候，得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赵元任教授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写石岐方言的著作^①，珠玉在前，原先将我本人有关石岐方言的调查结果另行出版的设想便显得多此一举。不过，与隆都方言相关的一些石岐方言信息终究还是纳入了本书当中。我所整理的中山客家方言资料，希望也能在今后某个时间另行出版。

本书中隆都方言的主要发音人是张太太（本名杨彩霞）。她1925生于石岐以西的申明亭村，在原籍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与我合作期间，她寓居澳门，是一位小学教师，与离澳门50公里的申明亭家人经常保持联系。除隆都方言外，她的标准粤方言讲得很流利，国语也相当好。但是她不懂外国语言。

本文采用高本汉所著《词典》^②中收录的汉字（经过某些删减和大量增补）作为调查卷，由张太太用隆都方言文读发音和白读发音进行朗读，并常常用短语和句子对白读用语进行了解释。调查卷经删减后，又交由申明亭学校的师生以及两位操隆都方言的石岐居民进行了核对。

文中的一些隆都方言白读文本系由张太太提供，记音过程如下：

① 赵元任：《中山方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18章《词典》。（Bernhard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Chap. 18, *Dictionnaire*.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5. Leyde, Stockholm, Gotenbourg, 1915-1926）。

首先用钢丝录音机录制张太太发音，其次由张太太书写成中文，最后由我本人标音。与此类似，文言文或国语文本也由张太太用隆都方言文读发音录制在录音钢丝，再由我本人标音记录下来。

我对有关材料的整理，直到1951年春才得以进行。1951年秋，我向斯德哥尔摩大学提交了题为《隆都方言音系》（*Lungtu Dialectens Fonologi*）的哲学副博士学位（*Filosofie Licentiat*）论文，然而未获出版。1953年，我终于重续对旅华期间所收集资料的研究，准备将修改扩充后的书稿出版。书稿于1954年11月向哥本哈根大学提交，于1955年7月8日被学校哲学系接受，纳入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

关于本研究的范围与目的简述，读者可参阅本书结束部分的英语和丹麦语结言。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得以在资助期内收集了用于本研究的资料。在此，我谨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哥本哈根大学表达我深厚的感激之情。

在拙作撰写的各准备阶段，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赵元任教授慷慨地给予了宝贵的建议与鼓励；另外，如果没有我妻子的支持，书稿写作的进程定然会更加缓慢更为艰辛；在我暂离哥本哈根期间，家父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关照本书的出版。在此，我谨向他们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原稿由维德塞加德（L.P.Vedsegaard）先生用Vari-Typer打字机打印，用胶印法印出。全书正文的中文字由哥本哈根的K.F.Hsu先生书写。另外，本人荣幸地得到了赵元任教授为书名页题写中文。

缩写表

- 厦方 (AM) : 厦门方言 (Amoy)
粤方 (CT) : 粤方言 (Cantonese)
福方 (FC) : 福州方言 (Fuchow)
隆方 (LT) : 隆都方言 (Lungtu)
石方 (SK) : 石岐方言 (Shekki)
汕方 (ST) : 汕头方言 (Swatow)
闽方 (SMin) : 闽南方言 (Southern Min)
白 (c) : 白读 (colloquial)
文 (l) : 文读 (literary)
助词 (FP) : 语尾助词 (final particle)
叹 (Int) : 叹词 (interjection)